

《植物名实图考》在近代中日间的流播

——兼论其书形象的“科学”塑造

梁 从国

摘要：自《植物名实图考》一书被“生产”出来后，它即在同为追求“近代”的中日两国间开始了穿梭的文化旅行。对日本而言，《图考》更多止于扮演知识资源的角色。然而就中国来说，《图考》具有双重性：它是“科学”的，被赋予了近代的内涵；它是民族的，是书写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文本。

关键词：植物名实图考；流播；形象

《植物名实图考》（以下简称《图考》）是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学专著，于1848年出版。它记载植物1714种，较《本草纲目》所载植物多出500余种。特别是该书图画精审，所绘植物特征明显，对后世识别和利用植物助益很大。吴征镒先生曾称赞它是一部奇书。¹有关其书研究著述可谓煌煌大观矣！²然而，据笔者所经眼的文章里，学界对于这一“奇书”在近代中日间的流播情况，仅止于一般的泛泛之论。³即以《图考》在日本的流播情况而论，多以植物学家伊藤圭介在小野职恣重修的《重修植物名实图考》（以下简称《重修图考》）一书中所作的序为基调，再重新加以叙事而已。而对于《图考》何以能为日本所引进，其时知识语境又是什么，探讨得不多，或者不够深入。国内学界也基本没有留意到还有一篇与伊藤圭介文字相仿的序言的存在，而这无疑为研讨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与此类似的，《图考》在近代中国的境遇梳理也欠粗糙。此外，《图考》这一文本何以具有“科学”的特质，它难道自“生产”出来后，便不证自明？此又涉及到近代国人是如何认知，并加以塑造的问题。以上这些，都有值得重新加以考量的地方。本文即对此作一番研讨，以期于《图考》研究略尽绵力。

一、《图考》来到明治时的日本

¹ 吴征镒等：《胡麻是亚麻，非脂麻辨——兼论中草药名称混乱的根源和〈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及作者》，载《植物分类学报》，2007年第4期。

² 以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编辑的《吴其濬研究》一书为例，共计收录论文29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查中国知网1992-2013年期刊，每年亦有相关研究文章。

³ 例如，在张瑞贤等校注的《植物名实图考校释》一书中，仅依据《植物名实图考》各版本的序言粗略描述了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传播情况，尚缺乏有深度的历史场景的叙述。参见张瑞贤等校注的《植物名实图考校释》（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47-648页）。

1883 年 10 月, 东京奎文堂开始刊行《重修图考》。它是日本学者小野职恣对晚清吴其濬的《图考》再加工的作品, 植物学家伊藤圭介作序(以下简称《伊序》)。最近笔者发现该作品的“句读人”冈松瓮谷也有一篇《重修植物名实图考序》(以下简称《冈序》)。⁴两序内容基本一致, 不过大致而言, 《冈序》略显得“原生态”些。经笔者初步研究, 断定“(冈序)是《伊序》的样品, 即《冈序》在前, 《伊序》后出。可能是冈松瓮谷依伊藤圭介之意先期写出序言, 再由伊藤圭介删改完成”。《伊序》是目前学界较为普遍使用的文献材料, 但就笔者而言, 《冈序》的价值或在《伊序》之上。⁵以下多以《冈序》为据, 除特别指出为《伊序》外, 其他均同之。

据《冈序》所言, 吴其濬的《图考》流传到日本经过了两个途径: 一是伊藤圭介阅读俄籍德人“布烈斯奈杜”(即 Emil Bretschneider, 汉名贝勒, 以下通用“贝勒”)对中国植物学文献作品的介绍(原文为英文小册子), 认识到《图考》的价值, 遂托人在中国购买, 获得此书; 另一途径则是日本东京出版机构奎文堂的老板野口爱从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所藏《图考》获得。⁶

先来分析贝勒的植物小册子。该册英文题为“*On the Study and Value of Chinese Botanical works with the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Plants and Geographical Botany from Chinese Sources*”, 1870 年在福州出版。⁷该册大部分内容在传教士所办期刊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中文名为《教务杂志》)上发表, 刊登时间为 1870 年 11 月-1871 年 3 月(月刊, 连续 5 期), 总第 3 卷, 不过标题改为“*The Study and Value of Chinese Botanical works*”。由于笔者手边没有 1870 年版植物小册子, 所能提供参照的是《教务杂志》所载内容及 1935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下简称商印)、石声汉翻译该册的节选本《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两相对照, 大致可以确定, 《教务杂志》刊登的内容省略了小册子中提供的从《图考》中选择的蜀黍、粱、薯蕷、檫麻、商陆、佛手柑、铁树果、椰子等八幅植物的图画, 但其他方面比石声汉译本更丰富完整, 基本可以作为 1870 年版的替代品。就笔者阅读体验而言, 贝勒点评中国植物学文献, 对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的评价也并不弱于他对吴其濬及其《图考》一书的态度。试以下面文字为例(中文部分为石声汉译文及其出处页码, 英文部分为《教务杂志》所载内容及其出处页码)。

①《纲目》为中国本草学者之名著, 有此一书, 足以代表, 其他固不必费辞也……李氏洵不愧为中国自然科学界卓越今古之一作家, 后此, 本草著作, 盖无能出其右者。(第 4 页)

It would be useless, moreover, as I intend to speak of the well-known treatise on Chinese materia

⁴ 冈森参太郎、井上匡四郎编:《瓮谷遗稿·卷二》, 东京: 吉川弘文馆, 1906 年, 第 10-11 页

⁵ 参见拙文《日本明治时期<重修植物名实图考>版本考述》, 载《或问》第 25 号(2014 年)。

⁶ 竹添进一郎(1842—1917), 讳光鸿, 字渐卿, 号井井, 世人多以竹添井井称之。晚年亦号独抱楼, 进一郎为其通称。曾于 1876 年 5 月 2 日至 8 月 21 日间游历中国巴蜀地区, 以此所写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于 1879 年刻印刊行, 在中日知识阶层产生了一定影响。该书有李鸿章、俞樾、钟文烝序文, 薛福成、曾纪泽题识, 并有俞樾、蔡尔康等人的评语(参见张明杰主编, (日) 竹添进一郎, 股野琢著:《栈云峡雨日记·苇杭游记》,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年, 第 3、9-10、12 页)。

⁷ 石声汉:《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弁言第 3-4 页。

medica Pen-ts'ao-kang-mu, for it is the type of all the Chinese productions of this class... It can be said, that Li is the first and last critical writer on Chinese natural science and that he has never been rivaled by other authors. (p.158)

②《纲目》实已不啻中国植物学完备之记载。(第 16 页)

The Pen-ts'ao gives a complete record of the botany of the Chinese. (p.161)

③ 同一植物，中国各省所用俗名，往往各异，亦恒为纠纷之端。《纲目》中所用汉名，为中国一切植物学知识之基础，故当地俗称而外，《纲目》中所用名称，当地居民必有能道之者。《纲目》中亦记有各地俗称，可以检得。(第 73-74 页)

It occurs often, that the Chinese in different provinces, have different names for the same plant, which must occasion much confusion. But in such a case the Chinese always know besides the local name of the plants, the book name also of the Pen-ts'ao, which they consider as the foundation of botanical knowledge. Li-shi-chen gives also a great number of synonyms of each plant. (p.241)

而贝勒对于《图考》的评述，略举数例如下：

④《图考》第四部之甘薯图尤极神似。(第 43 页。查原文，石声汉此处误译第四部，实为第六部——笔者注)

This suits perfectly with the Sweet Potato as also with the fine drawing of the Sweet Potato in the Ch.W.VI. (p.219)

⑤ 商陆之为 *Phytolacca*，盖不庸疑，《图考》精图，足资证明。(第 44 页)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Shang-lu is *Phytolacca*. See the good drawing in the Ch.W.XXIV. (p.219)

⑥ 书之一半为关于中国现知植物之记载，大部分颇紊乱混淆，共分六十章。印刷甚精良。其他一半则为图画，计一千八百幅，刻绘尤极精审；虽不无纰缪可指，然在中国植物学之著述中，当以此为巨擘焉。(第 22 页。此处石声汉漏译《图考》北京售价约为 14 元)

It contains 60 chapters. The one half of the work consists of a description (for the most part very confused) of the plants now known to the Chinese. The printing is very distinct. The other half includes nearly 1800 carefully executed drawings. Although here also many mistakes occur, this work is incomparably the best pictorial work of the Chinese of this class. The price at Peking is about \$14. (p.163)

⑦ 蚕豆 图考第一部，图极精美。(第 50 页)

Ts'an-tao,...Ch.W. I (a fine drawing). (p.221)

⑧ 青稞 《纲目》仅于大麦条下略及之。《图考》第一部第三十二页载之，且附有极精审之图画。(第 62 页)

The pen-ts'ao speaks of it briefly (Art. Ta-mai). The Ch.W.I.p.32 describes the Oats and gives an excellent drawing. (p.225)

⑨ 欲藉研究华藉之所得，以补欧洲科学界之缺陷，则不特当谙熟中文，且更当熟知中国植物之种属。于此乃更增一重困难：盖若该植物而果非寻常稔知之品，根据中国古代植物学者肤浅之记载，辄不能辨其究为何物。《植物名实图考》中之图画，其精确者往往可资以鉴定科或目。然寻常唯一可靠之法，则惟有在天然界觅得实际标本，检定其学名。顾兹事亦往往不尽可能。（第 69 页）

In order, that Western science may profit by a study of Chinese botanical works,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writing, but also to recognize the plants there described. This leads us to a new difficulty. If the plants in question are not generally known, it is for the most part impossible to recognize them from the vague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botanists. Sometimes the good drawings in the Chi-wu-ming & c. permit us at least to determine the order to which the plant belongs. But the only exact method of identifying Chinese names of plants, with their scientific names, is to obtain the plants in nature and to determine them. This is, however, not possible in all cases. (p.227)

不过，考虑到早在 17 世纪前半叶《本草纲目》便在日本流传广播，加之有数据统计从 1612 年至 1856 年关于《本草纲目》的著述达三十余种的影响来看，⁸想必伊藤圭介对《本草纲目》一书并不存在何种“新鲜感”，也就不大理会贝勒的有关言论。相反，正如上文所举例的④-⑨英文内容及八幅《图考》中的植物图画，它所给予伊氏的视觉冲击和心理感受当是强烈而有力的。《冈序》中通篇内容，都与“图写”相关。在读完贝勒的书后，伊氏说吴其濬《图考》水平远超宋元明诸本草家，因此，内心底很想获得它。得到书后，评价也是“图写亦甚备”。在奎文堂准备翻刻《图考》为小册时，伊氏又表示，尽管翻刻本较原版图画缩小，其实两者并没有差异。伊氏对《图考》的评价是“从来本草书所未有也”（《伊序》语）。在伊氏的眼里，既然《图考》达到了远超中国历代本草学家的高峰，那么，它的价值也就不限于本草学的范畴，而具有了新的意义。

据白井光太郎的说法，日本博物学的历史分为三期，第一期即上古至德川幕府统治前的本草学时代，第二期即德川幕府统治初至明治政府统治前的应用博物学时代，第三期即明治政府初期至今的纯正博物学时代。第二期的显著特征是博物学由本草学、名物学及物产学构成，而在第三期，由于受欧洲学术的影响，博物学一变而为植物学、动物学及地学（“地学”在明治时的日本具有地理学及地质学的混杂意味——笔者注）。⁹而小野益三也言，明治维新时期是日本博物学的近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¹⁰伊藤圭介、小野职恣在此期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庐列两人在《图考》传入日本前的工作相当具有趣味。例如伊氏便撰著《日本产物志前编》，参与编辑《东京大学小石川植物园草木图说》第一分册，并与矢田部良吉、松村任三等人创立东京植物学会；小野氏则翻译《植学浅释》，撰写《毒品便览》（内有有毒植物的木版画）等。可以说，在《图考》尚未在日本流传开来时，相当一部分知识人已经在学习和实践近代植物学的理论和方法了。《图考》确乎不能实现日

⁸ 参见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4-75页。

⁹ 参见氏著《增订日本博物学年表》，东京：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1908年，第1、3页。

¹⁰ 参见氏著《日本博物学史》，东京：株式会社平凡社，1973年，第9页。

本学人研究范式的革命，但它在考证、辨伪、存疑方面，在提供栩栩如生的图画方面，达到了旧式本草学所不具备的高度。何况它所提供的植物科、属名的汉名上，为松村任三编纂日本植物术语提供了知识资源（1884年2月出版的《日本植物名汇》，英文书名即为“Nomenclature of Japanese plants in Latin, Japanese and Chinese”）。笔者以为，在《冈序》中曾有言“余素重此书有裨于本草说”，而在《伊序》中改为“余素重此书”，是有一定道理的。如上文所说，《图考》具有了新的意义。在新的知识语境下，《图考》不再是对本草学的有效补充（其时本草学也已被西方知识体系所分割），而成为了日本知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可资借鉴之物，从而成为了近代知识资源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图考》包括《重修图考》在日本所具有的影响力及其流传是有一个宏大的背景作为支撑的。

此外，像《冈序》中所提到的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其人宦海浮游，本身兼具学者气质，与中国学人素有交好。他能够获得《图考》，当在意料之中。¹¹而作为出版机构的奎文堂，襄助刊行小野职恣主持重修的《图考》，打开《冈序》中所言《图考》所传不广的困窘局面，“搨数百本”，加之笔者所论证的《重修图考》除具有1883-1884年版本外，还有1883-1889年铅印本等因素，表明在其时日本的知识网络中，学界、出版界及政府间的深刻的互动关系，对于推动日本近代知识的生成具有相当的助益。

但也应该看到，《冈序》在某种程度上也保留了对《图考》的批评，“虽或有仍旧，不免简陋”。对于立志要求知识于世界，进行文明开化的日本而言，其学人的眼光和视野也就并不局限于长期受恩泽的儒家文化圈。用小野益三的话说，《图考》对弄清中国植物意义重大；然而，尽管有小野职恣的努力，但是对以中国的本草学为模范发展起来的日本博物学来说，《图考》传到日本还是太晚了。¹²

二、晚清民国时期的《图考》

吴其濬死后一年（1848年），山西太原府署便刻印《图考》初版。1880年，山西藩文书局重刻《图考》。这是学界的基本看法。不过，在笔者查询武汉大学图书馆馆藏书目时，竟意外发现有同治五年（1866年）刊刻的吴其濬《图考》及其《图考长编》，山西太原府印行。¹³笔者未曾亲到武

¹¹ 竹添进一郎如何获得《图考》一书，笔者仅依据逻辑推理，实乏事实根据，晚清学人中收藏或讨论《图考》一书者尚不多见。目前所知，1885年张绍棠刊行《本草纲目》味古斋本。该本即是张氏请许功甫将《图考》中之植物图改绘到《本草纲目》中，这大概是《图考》在传统本草学领域中的一次反响。本文后面还有相关论述。

¹² 同上，第147页。

¹³ 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图考》及其《图考长编》版式详细信息如下：（清）吴其濬著、（清）陆应毅校刊：《植物名实图考》三十八卷38册（4函）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二十二卷22册（4函），线装刻本，山西太原府，清同治丙寅（即1866年）。载体形态：30cm；9行24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卷一首叶版框高24cm、宽15.9cm。藏书上另有“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藏書之章”、“朱

大图书馆查阅是书，据有研究者曾征引。¹⁴故此确认一点：说明《图考》自1848年刊刻后，又有1866年再版本，此为学界先前所未明确说及，说明《图考》一书并非像先前所说湮没无闻，而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不过，自1880年山西潜文书局版后，直至清末，也不见《图考》再版的踪迹。颇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小野职恣重修的《图考》于清末新政时期回流到中国。由江西农事试验场编辑出版、时任该场场长的龙鍾伊主编的《江西农报》刊登。据目前所知资料，该报在1907年第5期至1909年第25期登载了《重修图考》的卷一和卷二部分内容，置放于“编译”栏目。此栏目除了载《重修图考》内容外，还有日人松村松年的《农场害虫人工驱除法》、《农场害虫药剂驱除法》，日人佐藤益助的《果树栽培教科书》、山田幸太郎的《家鸡割势术》、池田日生三《农业须知》、高桥久四郎《蔬菜草花栽培全书》等。¹⁵从此看出，《江西农报》多辑选的是与农业技术相关的实操性强的农学著作。选择《重修图考》，确乎有些不伦不类。笔者的推测是《重修图考》能满足识别植物、增加农作物见识的需要。不过这里还应该考虑的是，何以《江西农报》明知《图考》原为吴其濬所撰，却选择日人的《重修图考》，这岂非舍近求远？难道1848年初版、1880年再版的《图考》正如《冈序》中所言“此书在彼邦流传亦少”，而不易搜求？又或者《江西农报》无暇理会国内版本，而延续“编译”栏目一贯的从日本寻找知识资源的风格？据所知材料，两种因素都可能存在。1915年云南图书馆翻印《重修图考》时曾说，由云龙曾在清末京师大学堂学习时，到琉璃厂书肆求购《图考》，但一无所获，偶有流传之书，也都是日人的翻刻本。¹⁶又可从该报的发刊词窥见一斑。其言，“以研究学术，发达全省农业为目的”，“阐古学之余绪，师欧美之专长，改良土产，扩张利权”。又有言“发达江西农业为主义”，“将农事试验场所得之新理法”及“东西洋新发明之农学书报悉精详采”。¹⁷或者可作如是观，《江西农报》在搜求不得《图考》的情况下，将日人《重修图考》作为了东洋新发明之农学书，希冀促进江西农业的发展。鉴于材料的缺乏，该报刊载的《重修图考》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始终是一个疑问。

如上所述，民国初年，市面上流传的也多是日本小野职恣的《重修图考》。这也可从如下得到印证。1916年，著名中医裘吉生说，他在参照旧藏小野职恣重修的《植物名实图考》的基础上，撰成《草药图考》一书。¹⁸不过，裘氏利用《重修图考》一书，本意是为中医提供草药资源，而非

文長”方印印章字样。

¹⁴ 据任放著《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后附“参考文献”中有，“（清）吴其濬纂：《植物名实图考》三十八卷，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字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0页）。

¹⁵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2卷（中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09-2215页。

¹⁶ 氏撰《重刊植物名实图考序》，该序文见于张瑞贤等校注：《植物名实图考校释》，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8年。

¹⁷ 参见宇文高峰等：《〈江西农报〉的编辑特点及其借鉴》，《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7年第2期；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9页。

¹⁸ 裘诗庭编著：《近代名医裘吉生医文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扩大《图考》的影响力。事实上，在裘吉生表达这番话的前一年，即1915年，以云南图书馆重印《重修图考》石印本更能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分析该石印本中由云龙的序言（以下简称《由序》），也相当有趣。由氏是从京师大学堂日籍教师矢部吉桢处知晓《图考》的价值，似乎正印证了《图考》本身在晚清不被重视的尴尬命运。这就不奇怪他要发出“吾国以驰骛帖括之故，弃实蹈虚，致数典而忘祖，反舍己以芸人，如此类者，何可胜道”的愤懑之情。而在北京搜求《图考》不得的情况下，他想起曾在日本游历的同乡云南昭通人张仲康藏有购自该地的《重修图考》（由云龙为云南姚安人——笔者注），但其时张仲康在担任云南省立第二中学校长时已死，昭通人姜勉之（曾留学日本东京师范学校）继任。于是获得后者的帮助，取得张仲康所藏《重修图考》一书。由氏对日人《重修图考》赞叹不已，称言“叹其工致，盖犹明治初年木刻者也”。他又称赞《图考》，“命名区类既极精审，系之以图，申之以说，亦复明确详尽”。可以看出，其对《图考》的评价明显受到日人的影响，尤其是《重修图考》中的《伊序》。在推介《图考》时，由云龙又把同乡观念引入其中，说吴其濬曾任云南长官，《图考》中引用了很多云南物产，而负责刊行初版《图考》的陆应谷也是云南人。想必他为从拥有《重修图考》一书也是云南人，到负责重刊《重修图考》的自己也是同省人而自豪吧。至于该石印本的影响，下文再略作分析。

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张珽（号镜澄，曾任武昌高师植物学教师，后学校改名武汉大学，任植物学教授），曾在一次学术演讲中，谈及往事，“这一部书（指《图考》）编就以后，没有多的人知道，直到后来被一位德国人得着了。他就将这部书带到了俄国，后来又被一个日本人在俄国看见，这个日本（原文似缺‘人’字——笔者注）又将牠带回日本去翻印，为中国留学生所看见。然因此书藏于日本图书馆，不轻易卖出，所以很不容易得着。兄弟费了许多力，才买了半套。回国以后，在北京看见了两套，我就替武昌高等师范买了一套，现该书尚存于武汉大学。现在，商务印书馆也有这本书的印版”。¹⁹据前揭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图考》版本信息，笔者推断当日张珽所购之书，即为目前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1866年刻本线装《图考》。²⁰再将张氏原话与前述对照，似有值得考量的地方。一是“德国人”显然指的是俄籍德裔人贝勒，这一误说似乎影响到他的学生，曾翻译贝勒著述《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的石声汉。二是张氏在演讲中可能混淆了《图考》和《重修图考》。上文曾言《冈序》中论及获得《图考》的两条途径：其一是伊藤圭介托人购买，其二则是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所藏。张氏有关《图考》在日本流传的信息来源，或者来自于留日学生间的口口相传，或者来自于他所经眼的《重修图考》。以常理推论，张氏在日本所修的是博物科植物学

¹⁹ 张镜澄演讲：《中国本草学与近代生物学的发达》，载《华中生物学报》，1934年6月第1卷。

²⁰ 笔者推论如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名存在时间为1913至1924年，该校校名多有变迁，至1928年改为国立武汉大学。张珽回国在1912年前后，任职武昌高师在1914年，他购《图考》当在此后，而馆藏《图考》有“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藏书之章”字样。该演讲时间为1934年4月16日前，刊发时间为1934年6月（参见西星记：《这半年的会务》，载《华中生物学报》，1934年6月第1卷第1期）。时张珽已为武大名教授，王其澍赞其“谨慎谦和”（该语见王其澍撰《我所知之张镜澄先生》，载《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校生物学杂志》，1924年第6卷第1期），演讲当不会随意发挥。

专业,他不难获得阅读《重修图考》的机会,而《图考》在日本颇难见到,他所说费了很大劲才买到的半套应是《重修图考》。因此,有较大可能是张珽读过《重修图考》中的《伊序》(该序与《冈序》论及《图考》流传情况大体一致)。以同为留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又成为张珽同事王其澐的说法,张氏记忆力很强。²¹对于《图考》如何传到日本,若干年后再回忆起也不会陌生。如果推断无误,那么张珽在演讲中至少遗漏了伊藤圭介如何取得《图考》一事。再据现有的材料,表明竹添进一郎不曾游历过俄国。竹添氏获得《图考》,倒有可能来自和中国学人交好中而产生的一次文化交流事件,而非经贝勒之手再拿到日本翻印。因为,时隔不久,本文前揭注释中所说 1885 年《本草纲目》味古斋本,即利用了《图考》中的图画,或许能说明在当时的晚清中国,《图考》并不难获得。因此,不论张珽在这次演讲中有何史实错误,但他绝没有提到 1915 年云南图书馆石印本的《重修图考》。如果他看过这一石印本,想来对其中刊印的《伊序》印象深刻。相反,张珽提到了商印的印版。这从侧面说明,1915 年版的《图考》影响面并不是很大。它的印数据说只有 200 部。²²不过,张氏能购买到晚清版本的《图考》,说明《图考》在晚清民初的阶段,在市场上的出现是偶然性的、断续性的。因为在此不久前由云龙在北京琉璃厂就搜求而不得。《图考》的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笔者以为是 1919 年上海商印的版本。

在谈论上海商印版的《图考》之前,还应该提及同年山西官书局印行的《图考》线装木刻本。²³该版本依照 1880 年山西潘文书局刊本,时任山西督军的阎锡山为之所作《重印〈植物名实图考〉序》(以下简称《阎序》)。相较先前的《由序》而言,《阎序》较为敏锐地意识到近代科学中作为一门学科的植物学,存在在教材与社会需求间的供应关系。阎氏认为,《图考》是“精于讲求植物之善本”,重印该书可使古籍得以流传,又能满足读书人的癖好,给予其研究植物的借鉴。²⁴然而,阎氏的愿望可能会打不少折扣。此次山西官书局仍采用了保守的印刷技术和装帧方式——总计 60 册的线装木刻本,一如 1880 年版的《图考》;并且印数也不可能很大。这样的做法或许对延续古籍的形态、对保持传统士人的情调有帮助,但对于其时已采用现代学制的中国教育,显得不合时宜。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情况。一例是 1920 年 9 月 25 日时任美国农业部藏书楼会长的施永高(Walter Tennyson Swingle)给商印监理张元济写信,说及阎锡山曾寄给他山西官书局版的《图考》,恳托张

²¹ 参见前揭文《我所知之张镜澄先生》。

²² 于乃义撰:《云南图书馆见闻录》,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文化教育编·第 16 卷(20-16)·社会科学 科学技术 医药卫生 体育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年,第 595 页。

²³ 《图考》木刻本,详见张雪琴:《从浚文书局到山西书局——近代至民国时期的山西图书出版业》,载《新闻出版交流》,2003 年第 5 期。此外,张元济 1919 年 10 月 20 日日记中载美国人施永高托他购木板《图考》四部,张氏最后函托晋馆代购直寄。而施永高于 1920 年 9 月 25 日则回复说,已收到阎锡山寄来《图考》一书,由此推测山西官书局 1919 年版《图考》为木刻本。参见见《张元济全集·第 7 卷·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143 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六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年,第 300 页。

²⁴ 氏撰:《重印〈植物名实图考〉序》,山西官书局 1919 年秋版。

元济在北京的分馆能代购十部，其中有两部还需分送给另外两人。次年3月20日张元济回信，表示还没有办理，并问是否还需要代购等语。²⁵这似乎从侧面表明，1919年山西官书局版的《图考》发行量不是很大，否则，以张元济的身份，购买十部当不在话下（当然这其间张氏解释另有他事处理，不过复信确实晚了许多）。再一例则是当代人所传颂的郭象升（1881-1941，山西藏书家）的事迹，即他在动荡的时代，保存了山西官书局尤为珍贵的《植物名实图考》印书版片一事。²⁶而上文张珽在演讲中也没有提到这一版本，似乎也提示我们它的受众面不是很广。

1919年冬天，上海商印的《图考》终于面世。从主持该馆事务的张元济日记可以看出，出版《图考》经历了一个相对长的时间。1917年2月9日张氏记载，他与馆内同仁已“商定《图考》用排印，图制锌板”。1918年2月10日及2月18日的日记记载了两次张氏焦灼的心情，希望《图考》能迅速刊出。而到了次年6月25日，他还问及《图考》何时能够刊行。²⁷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套洋装二册的铅字本《图考》（《图考》及其《图考长编》各一册）。该版本是以1848年初刻本为基础精印，第一次将《图考》及其《图考长编》压缩成二册发行，较之先前初刻本、1880年版本60册及其山西官书局重印本、1883-1884（或者1883-1889年）日本东京奎文堂版本48册及其云南图书馆重印本，无疑更利于书籍的传播和流通，携带也更为方便一些。价格因素也是需要考量的问题，商印的《图考》售价在大洋十二元，而山西官书局版的图考每部“时价十五元，邮费一元”。²⁸另外，从《校印〈植物名实图考〉序例》（简称《序例》）中也可看出，商务版的《图考》采取了更符合现代人阅读的方式，即它将“书中植物名称依第一字笔画多少，制为索引表，附于图考卷末，以便检查”。还值得注意的是，《序例》中明显吐露了商印迎合国外学人需求的旨趣，它以欧美日本为例说明此书为“世界学者所注目，声价日重”。²⁹一方面固然从潜意识里希冀国人能以外人为榜样奋发图强，孜孜以求，而在另一方面则不无谋求开拓《图考》的海外市场。从客观而言，商印的这一做法无疑扩大了《图考》的传播范围。或许正因为上述因素，次年，张元济在股东会议上发言称，《图考》销路得不错。³⁰此后，商印还发行过《图考》的万有文库本（王云五主编，1936年3月出版，列入“国学基本丛书”），《图考》从此获得“国学”的尊崇地位。1938年容媛受托为

²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六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300页、304页。

²⁶ 薛愈《山西藏书家郭象升》，见于山西省文史研究馆《文史研究》编辑部：《文史研究》，太原，1989年，第150页；刘贯文等主编：《三晋历史人物》（第四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19页。

²⁷ 《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52页、328页、331页；《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第86页。

²⁸ 参见龚启鏊《中华植物学进步史》，载《博物杂志》1919年第1期。

²⁹ 《序例》参见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季冬。

³⁰ 见《在民国九年商务印书馆股东常会上的报告》1920年5月8日，载《张元济全集·第4卷·诗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62页。

国外小型图书馆开一中国国学基本书目,内中就列有《图考》。³¹商印还发行过 1919 年版的缩本(笔者在上海图书馆馆藏书目中查到商印 1939 年 1 月在长沙出版的缩本第二版,尚不知初版何时印出),并对《图考》进行了广告宣传。³²相应的也有报刊对商印版《图考》进行了介绍。³³到 1949 年中共执掌政权前,全国的其他出版发行机构罕有刊印《图考》。它完全成为上海商印唱独角戏的舞台。

借助于商印在民国出版机构中龙头老大这一平台,《图考》在民国知识阶层中得以流行开来。曾于 1906、1907 年间编撰《理科杂志》的薛凤昌,于 1914 年发文论述中国博物学的历史,竟没有提及《图考》一书。³⁴约在三年后,张元济日记便记载《图考》的出版事宜。而在 1919 年商印出版《图考》后,除上文张珽提及该版外,又有吴元淦、沈其震、吴征镒等人先后提到。³⁵1920 年,有人曾言,“《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久已脍炙人口,风行海内外”。³⁶虽不无夸张之意,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图考》的流行程度。1936 年舒新城等主编的《辞海》中“植物名实图考”词条,还借用了商印版的《序例》中的语句。³⁷吴其濬的声名是与《图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21 年 6 月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便有“吴其濬”条目,记载言,“吴其濬,清其彦弟。字淪斋,号雩娄农,嘉庆进士,官至陕西巡抚。精研植物学,著植物学书颇多,《植物名实图考》最著称于世”。³⁸该辞典此后一直再版,到 1938 年已印至第 7 版。上世纪 80、90 年代,它还被上海书店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翻印。刘炳藜等编《中外人名辞典》中也收有“吴其濬”词条,同样介绍了《图考》的地位。³⁹由潘念之、张采苓编纂的《思想家大辞典》还将吴其濬纳入了“思想家”行列,称为“中国博物学家”、“中国最早之植物学者”。⁴⁰这当然更是与吴其濬著述的《图考》分不开的。

总结起来,《图考》在近代中国的流播,以 1919 年为节点,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³¹ 氏撰《经籍要目答问》,载《史学年报》,1938 年第 2 卷第 5 期。

³² 参见孔庆莱等编:《植物学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年 7 月第 4 版之广告页——《校印〈植物名实图考〉长编》。

³³ 张佑周《书报介绍》之《万有文库——〈植物名实图考〉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载《农报》,1936 年第 3 卷第 27 期。

³⁴ 氏撰:《中华博物学源流篇》,载《博物学杂志》,第 1 卷第 1 期。

³⁵ 参见吴元淦撰:《植物分类发达史》,载《博物学杂志》,1922 年第 1 卷第 4 期;沈其震撰:《我国本草学之沿革》,载《光华医药杂志》,1936 年第 4 卷第 2 期;吴征镒:《百兼杂感随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4 页。

³⁶ 吴续祖:《补〈植物名实图考〉》,载《博物杂志》1920 年 4 月第 2 期。

³⁷ 舒新城等主编:《辞海》上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木部 八画”第 171 页。

³⁸ 臧励稣等编纂:《中国人名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 年,第 313 页。

³⁹ 刘炳藜等编:《中外人名辞典》,昆明:中华书局,1940 年,第 263 页。另注:该辞典至 1947 年 8 月发行至第 3 版。

⁴⁰ 氏编:《思想家大辞典》1934 年 7 月初版,上海:世界书局,第 194-195 页。另注,该辞典于当年 10 月即出第二版。

1848年初版至1919年上海商印出版《图考》前。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一、地方性出版机构印书，不具有向海内外的扩散性。像山西藩文书局及其改名后的山西官书局便是，云南图书馆也是。二、受制于印刷技术，《图考》印数数量不大。三、日本小野职恣的《重修图考》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可以作为学界常说的清末民初思想文化界大受日本之影响的例证。第二阶段则是从1919年商印出版《图考》后至1949年建国前。这一阶段，由于商务印书馆的地位及其辐射力，由于它采取了新式的印刷技术，同时，在国内外形势日变，努力寻求知识资源的浪潮中，它适应并推动了这一趋势，因而，《图考》得以在社会上布散开来，并被列入到“国学”行列，成为我们今日所习知的经典。

三、《图考》在近代中国的形象塑造

先从一段材料说起吧。在本文第一部分^⑨中，贝勒的原文为“Sometimes the good drawings in the Chi-wu-ming & c. permit us at least to determine the order to which the plant belongs”. 石声汉将“order”译为“科或目”。笔者以为，石氏此处译法欠妥。英文“order”仅表示“目”，不到“科”的层次。他或许是想说明《图考》的图画精美而引申发挥了，但贝勒的原意并非如此。贝勒在该文字后有一句“然寻常唯一可靠之法，则惟有在天然界觅得实际标本，检定其学名”也可作出说明。但国内学界意图表明《图考》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时，时时将石声汉所译之语“《植物名实图考》中之图画，其精确者往往可资以鉴定科或目”加以引用，甚至延伸到“种”这一层次。⁴¹这一例证说明，在没有深入探讨《图考》最初的西人评价的来源时，研究者极易为已有的著述所述惑（或许还有民族情感的成分在内），作出不甚恰当的评价来。

1928年正式刊印出版的《清史稿》中，列传部分记述了吴其濬一生的事功，但竟然没有提及《图考》一书。而在其艺术志里，它把《图考》放入“谱录类”，并用了相当简短、冷静、客观的语言来描述，“《植物名实图考》，三十八卷，吴其濬撰”。⁴²这对于当今的研究者而言，可能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然而，如果虑及到《清史稿》撰述者的阶级立场及其知识构成，或许我们能从中探索点不一样的《图考》认知，从而深化研究者对历史丰富性的解读。

在《图考》于1848年出版时，山西太原知府陆应谷曾为之作序，叙述《图考》一书特点不仅在于辨别植物的形色性味，摹形绘图使之名实相符，更在于它透露出吴其濬有一颗疗治民生疾苦的至仁之心。可以说，这是传统儒家士大夫的一贯思维方式，即“术”或“技”在知识学问中并非

⁴¹ 黄胜白较早引用了贝勒的说法（中国植物学会编：《中国植物学会三十周年年会论文摘要汇编》，北京：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版，1963年，第160页）。梁家勉则进一步表示《图考》可到“种”的层次【《科技史文集（四）》（生物学史专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第21页】。其后苟萃华等著的《中国古代生物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22页）、刘昭民编著的《中华生物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13页）和朱林宝主编的《中华文化典籍指要》（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03页）等都引用了梁家勉的说法。最近引用这个说法的是丁兆平（氏著：《中药传奇》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第103页）。

⁴² 分别参见《清史稿》卷381、列传第168；《清史稿》卷147，志第122。

不占有一定的位置，只是要通过“术”或“技”实现他们所谓的“德”与“道”。后来（即 1880 年）曾国荃继之而写的序言表明，他将《图考》视为医学书籍的重要补充，视野较之陆氏颇显得狭小了些。陆、曾二氏均为传统学人，他们的知识储备和认识能力不足以对《图考》一书作出颠覆式的解读。前述中医裘吉生将《重修图考》视为本草一书，也可作如是观。这一变化的端倪出现在 1907 年《江西农报》登载《重修图考》以及后来由云龙所作之序。如上文所述，鉴于材料的欠缺，我们至今对前者刊载《重修图考》尚无明晰的了解，但有一点是可以断言的，即是清末知识人在引介日人书籍时，是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来看待这一行为的。无疑，这一认知模式对于改变传统士大夫的就本草论本草，“术”与“道”的知识范畴，具有以进化论为底基的近代象征意义。而后者呢，清末由云龙接受了来自日本的近代教育，他在《由序》中说古籍如《滇南本草》、《滇海虞衡》等，都距离科学的标准相差万里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赋予了《图考》“科学”的特质，尤其是其中蕴含的科学方法，“命名区类既极精审，系之以图，申之以说，亦复明确详尽”，就表明了这一点。不过，正如前文所言，《由序》的评价明显受到了日人的影响，使得我们有理由怀疑，由云龙是否真的从这一方面理解了《图考》？

事实上，在山西官书局和上海商印重新翻印《图考》之前，民国学人已经对《图考》作出了较为清楚明晰的、恰如其分的论断。1917 年 10 月，伍光建为商务图书馆出版的《植物学大辞典》一书作序，言“道光间，吴其濬、陆应穀撰《植物名实图考》，绘图备说，论列一千八百余种。根据于目验者甚多，可谓空前所有，为一时杰作矣。志切济时，不以多识草木之名目诩。中外学者，至今赖之。”⁴³此一评语为笔者所见民国时人较早对《图考》价值的论断，值得重视。其后，任职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的龚启鏊（时任该会书记干事），于 1918 年 11 月 3 日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华植物学进步史”的演讲，后被刊发在《博物杂志》创刊号上（即 1919 年第 1 期）。⁴⁴演讲中，龚氏将中国植物学史分为四个时期：A、“自强不息时期：由上古神农时代至东周战国之末即至秦庄襄王三年（即公元前 247 年）”。B、“旁系维系时期：由秦政即位之元年起（即公元前 246 年）至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止即至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出版之前一年（1847 年）”。C、“乐观时期：由清宣宗道光二十八年即吴氏《植物名实图考》出版之年起（即 1848 年）至今年（民国七年，即 1918 年）更从今年至民国二十年止（即 1931 年）”。D、“长足进步时期：由民国二十年起到民国亿万年，皆为长足进步时期”。可以清楚地看出，该文值得注意的要点有如下：一是由笔者目前所据史料而言，应是龚氏第一次将中国植物学史分为数个时段，虽然稍显粗糙，过分申引（尤其划分未来时段，实为叙史之大忌），但其中所蕴涵的进化意义不难理解。二是它明确将《图考》列为历史分期的关键节点，将《图考》置入中国整个历史的长河中来考察，无疑较之前人视野更为概括，论述亦更为有力。三是它将《图考》置于第三时期的首端，同和晚清西学东渐并放入这一时期，从

⁴³ 伍光建：《〈植物名实图考〉序》，孔庆莱等编：《植物学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年 7 月第 4 版。

⁴⁴ 该文后又为《陕西实业杂志》所收录，见其 1924 年第 8 期等。

而赋予了《图考》特别的地位和新的意义。它称赞《图考》“开我中华植物学进步史乐观时期之第一声，实为一种极有价值之著作”，表现在《图考》“分为三十八卷，共记载植物一千七百零四种（此误，应为1714种，笔者注），一一作精确之图，更为《图考长编》，将前记植物，又分为二十三卷（此误，应为二十二卷，笔者注），搜罗历代书籍地志之所言说，详为考证品评而记载之。另有所附益，诚巨观也”。它还纠正旧日说法，“日本关于植物学之知识，世人皆评为受我中华《本草纲目》之赐，殊不知其今世有名植物学家，关于东亚植物之研究，尤奉此书为圭臬也”。对于此书缺点，该文也毫不隐讳，认为《图考》“分类甚旧，尚仍《本草纲目》，对于隐花植物，亦少研究”。可以说，龚氏相当了解《图考》的知识涵量及其地位。他以中国植物学学科史的名义，同时“比较于泰西植物学进步史”，“藉以觉悟我中华历代科学不发达之故”，事实上也就定义了《图考》的“科学”价值，《图考》的形象也由此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应该提及的是，龚启镛当时还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二年级的学生。此后，像山西官书局《阎序》的撰著者阎锡山，就曾留学日本，而上海商印负责《图考》的编译所主持人为杜亚泉，同样也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教育。我们虽不知《序例》的著者为谁，但至少可以肯定该文是获得杜亚泉同意刊印在《图考》卷首的。可以这样说，至少在1919年前后，国人对《图考》的形象认知，已基本处在一个新的知识语境下所进行的叙事。

1922年及次年，吴元淦（时任《博物学杂志》总编辑）先后发表《植物分类发达史》、《中国生物学发达史》两文，⁴⁵对中国生物学史进行了梳理。尤其在后文中，吴氏也将中国生物学史分为三个时期：上古期，即从神农时代到秦王朝；中古期，即从西汉至南宋朝；近古期则从元朝至晚清戊戌变法止。不过，尽管他认识到《图考》在中国生物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中国古来生物学史之沿革，至此（指《图考》）遂告终焉”，但从学科史的角度而言，尚不如前文龚启镛的分期来得高明，因为在《图考》诞生前后，西学的浪潮已开始袭来。但我们仍要注意的是，吴氏在两文中均称赞《图考》“论形述用，考证渊博，极有科学的价值”，则是第一次从正面肯定了该书所具有的近代内涵。

三年之后，周建人发表《〈植物名实图考〉在植物学史上的位置》。⁴⁶他从学理的角度，将植物学的发展分为两个层次和三个阶段，即实用和纯理植物学层次，药用、农用植物的记载阶段、赏鉴植物的记载阶段和纯理植物学的阶段。周氏指出，《图考》“是在第三步转变期（指纯理植物学）的一部重要的书”；《图考》的价值，“其实还不在于有精细的图，而在许多的图都从实物描绘，所以并非抄袭他书或臆测者可比”，而且吴其濬“据实物考证，绘图说明”，在解决历来争论不休的植物名实相符方面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此外由许多我们常见的植物，多不知其旧名的，在他的书上可以找到不少”。因此，“《图考》是中国植物学中最近的，也是真正的植物学发端的书。经过这一个时期，才有形态、生理、生态、遗传等学的发达。在吴其濬的《图考》这一时代是分类记载的时期，即叙述植物学的时代”。而这一时代与“西洋近代植物学的趋势”有所交叉，只不过后者“更从各

⁴⁵ 分见《博物学杂志》1922年第1卷第4期及《农学》1923年第1卷第3期。

⁴⁶ 载《自然界》，1926年4月第1卷第4号。

个不同的方面去研究更专门的学问”，例如植物形态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及物种学等。他更进言，我们“不可忽视了开创近代植物学的《植物图考》，并且不可轻视了吴其濬在近世植物学上的工作”。纵观近代中国，就笔者所搜集的材料来看，直接以《植物名实图考》为主题探讨的文章只有周氏的此篇而已。如果说龚启鑫的《中华植物学进步史》有点科学“外史”的意思，那么周建人的《〈植物名实图考〉在植物学史上的位置》则实在有着科学“内史”的含义。周氏对《图考》学术内涵的梳理，较为坚实地奠定了《图考》近代的、科学的形象。

此后，张珽、陈伯康（时任华中大学生物学系主任）的演讲，都明确表达了吴其濬“用研究科学的态度”，对植物进行实地研究，并画出图画，《图考》能作为“现代研究植物分类学者的参考”。⁴⁷其时在生物学界颇有声誉的胡先骕发文还称赞吴其濬“驳驳有纯粹科学研究之楷模”。⁴⁸当然，也就无怪乎前述潘念之、张采苓编纂的《思想家大辞典》中对吴其濬给予“中国最早之植物学者”的称谓。抗战期间，从事动物学研究的张孟闻曾在刊物上发表《中国生物分类学史简述》一文，也称述“《植物名实图考》，详博精密，亘古所未有，东西学人，视为东亚植物分类学之要籍”。⁴⁹而在该文刊出的当年年底，张氏又对此文进行更改补正，添加了“（吴其濬）以旧学儒者，未习科学，但能不蔽于古，务证诸今，故考核翔实，著为不刊之名典，致足尚已”等语句。⁵⁰这些也同样重塑了吴其濬及其《图考》的新形象。

综上所述，自《图考》一书刊印后，随着西学的浪潮持续不断地冲击和分解中国的知识体系后，近代国人因着个人知识构成的不同，在对待《图考》的认知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同的归类标准和形象评述。但总体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国知识人在形塑《图考》之际，受已有的欧美日本认知的影响，加之自身已接受新的知识资源，因而，《图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被形塑的“科学”象征。

四、余论

站在今人的立场，回溯民国学人对《图考》的介绍和评述，仍觉其中大有值得加以推敲和深化研究之处。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吴其濬《图考》的研究方法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在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此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学理上的清晰梳理，而更多带有点到为止的表象描述。1919年8月，胡适在写作《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一文时，即提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汉学可以当得起‘科学’的名称”，汉学家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

⁴⁷ 分见张镜澄演讲，前引文；陈伯康《生物学在中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载《华中生物学刊》1935年第2卷。

⁴⁸ 氏撰：《发刊辞》，载《中国植物学杂志》1934年第一卷第一期。

⁴⁹ 氏撰：《中国生物分类学史简述》，载《思想与时代》1942年5月第10期。

⁵⁰ 张孟闻对题目也进行了修改，名为《中国生物分类学史述论》，该文被收入氏著《中国科学史举隅》（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第52页；《民国丛书》第一编上海书店影印版，1989年）。此文后经作者于1987年4月校订，载《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第6期。

⁵¹在与胡适学术交往过程中，梁启超著述的《清代学术概论》同样提出，“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而“清学”的研究法，已近于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⁵²而近人的研究显示，吴其濬的《图考》的确受到了乾嘉汉学考据方法的影响。⁵³这无疑提示了我们何以《图考》在民国时期形象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因由。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民族主义话语在其中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上文所述民国时人在书写与中国生物学尤其是古代相关的史实时，实则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希冀通过陈述前代先贤的业绩，展示中国具有值得珍视和称赞的历史，从而激发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进而将本国学术发扬光大。前揭1914年薛凤昌于叙述中国博物学源流时，就告诫国人，如果仅仅“稗贩东籍，收拾牙慧，不惜弃我国固有之物名”，此实为“我国博物学不振之症结，抑亦全国学士大夫之愧耻也”。⁵⁴吴元浹更提倡“使吾国之生物学，得有独立之精神，发明之创造，毋专为模仿的，贩卖的之传授”。⁵⁵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方文培，也曾说“纯粹之中国植物学应以中国植物为材料，确定其名称，考察其形态、性质、及功用等”。⁵⁶而像刊载前引周建人文章的刊物《自然界》，它的目标即是“科学的中国化”。⁵⁷于中国而言，近邻日本既是学习的垂范，也是民国学人书写自身科学史的动因所在。著名科技史家何丙郁就曾回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历史派”，对中国文明的低估，使得能稍微慰藉国人自豪感的中华文化，在国人的心中，也变得紧张微妙起来。⁵⁸张孟闻《中国科学史举隅》一书自序所言，“东邻论者辄谓我国无学术，又瞽于科学。兹故展陈前人致力于科学之业绩，上起诗书，下迄并世，摘采纲要，藉见大凡；亦所以示民族文化禀承之丰厚，有待于检取而融会新智以恢弘发扬之”，⁵⁹便是此等刺激的结果。

建国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被宣传推广，它既是中共抗战时期提出的建国纲领，也与民国时期科学民族化的思潮相耦合。1953年，中国科学社在编印“中国科学史料丛书”时，即领会中央人民政府的教育方针，提出“每门科学就得有每门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史。祖国是具有悠久而光辉的历史的，在科学领域里也有其灿烂辉煌的业绩”，⁶⁰进而编写了中国植物生

⁵¹ 该文见《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1月第1卷第5号，续文见前引刊1920年第1卷第7号、1922年第1卷第9号。

⁵² 氏著：《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6月第4版，第51页、49页。

⁵³ 参见郑亨钰撰：《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科学方法探微》，该文收入前揭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编：《吴其濬研究》一书，第55-58页。

⁵⁴ 见前引《中华博物学源流篇》一文。

⁵⁵ 前揭吴元浹《中国生物学发达史》一文。

⁵⁶ 氏撰：《中国植物学发达史略》，载《科学世界》1932年12月第1卷第2期。

⁵⁷ 《发刊旨趣》，载《自然界》1926年1月第1卷第1号。

⁵⁸ 氏著：《何丙郁中国科技史论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0-351页。

⁵⁹ 氏著，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序”第4页。

⁶⁰ 参见《中国科学史料丛书总序》，载吴襄、郑集著：《现代国内生理学者之贡献与现代中国营养学史料》，上海：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1954年，第i页。

理学、营养学、解剖学、数学等科学史料书籍。同时，从事动物学及遗传学研究的陈桢，于 1954 年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论说“中国科学的落后，只是近三百年来事。但这并不是说在近三百年来我国科学毫无进步，这只是说近三百年来西洋的科学进步得很快，而我国进步得较慢，相形之下，就显得落后了”；并提出《图考》“内容已相当现代化，合乎科学原则”的论点。⁶¹相比较他于 1933 年编著的堪称教科书典范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生物学》（上海商务印书馆版，该书至 1951 年 7 月发行达 181 版），其中所附录的“生物学发达史一览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此表只是有关欧美的生物学史，根本没有涉及中国的生物学史。从前述民国时的线索来看，这已成为相当容易理解的现象。

无疑，《图考》形象的转变，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下的一个缩影。它是“科学”的，预示着中国自古至今的学术生命力。它是中国的，也就成为书写民族文化、表达民族自豪感的象征符号。

The Spread of *Chongxiu Zhiwu Mingshi Tukao* between Modern China and Japan

LIANG Cong-guo

Abstract: The book of *Chongxiu Zhiwu Mingshi Tukao* had begun a cultural shuttle journey between modern China and Japan since it was produced. As far as it in Japan was concerned, it was considered as a role which supported mo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Japan. However, this book in modern China consisted of dual meanings. On the one hand, it was remodeled as a modern image and regarded on the verge of modern scie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belonged to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tex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ritings.

Key Words: *Chongxiu Zhiwu Mingshi*; the spread; image

⁶¹ 陈桢等著：《关于中国生物学史》，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 年，第 10、11 页。